

大湾区的前世今生： 不该被遗忘的任仲夷（2）

门外，官府专门给他们划了块地叫作“藩坊”。坊间流传的大新街的“珍珠玛瑙次第排”美誉，就是“藩坊”繁华热闹的缩影。当时的广州，既是水陆杂陈的名利场，也是风月繁华的销金窟。

宋元之交，广东又一次在历史上留下了惊鸿一瞥。1279年，南宋与蒙古军队在崖山（在今广东江门）进行大规模海战。这场大宋的落幕之战，以丞相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告终，宋朝十万军民跳海殉国，也标志着新旧纪元的分野。

从明代初年开始，广州就被指定为专门与东南亚、印度洋地区国家进行“朝贡贸易”的唯一港口。尤其到了明世宗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撤销浙、闽市舶司后，广州更获得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。明清以降，尽管海禁政策时有反复，但广州作为海外贸易合法口岸的地位从未变过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，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。从此，广州独揽全国海外贸易特权近百年。今天我们在史书记载中看到的那些西洋“珍奇之物”，如望远镜、西洋钟等，大都是通过这个窗口进入中国的，丝

绸、茶叶和瓷器等也多是通过这个渠道远销海外的。“岿峨大舶映云日”的商贸往来，成就了广州“游人过处锦成阵，公子醉时花满堤”的繁华市井生活，也给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。汤显祖贬谪广东途经广州时写下的“临江喧万井，立地涌千艘。气脉雄如此，由来是广州！”，堪称这千年商都盛景的最佳写照。

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，1949年国民党败退，大量内地富裕人家，诸如董建华家族、包玉刚家族，还有电影界大佬邵逸夫等，都选择迁往香港。国统区大量的财富、人才涌入香港，奠定了香港的产业基础，成就了香港在20世纪中期的高度繁荣，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提供了最初的动力。

从丝路海疆到洋务商行，因海而兴、因海而富的珠三角始终得风气之先；在风云变幻、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，广东也有着“思想摇篮”的美称。从康梁的“公车上书”，到黄遵宪首倡仿效“明治维新”，再到孙中山誓师北伐，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扮演着“报春花”的角色，对近代中国的



粤港澳大湾区

思想、变革、革命等方面的贡献之大、影响之深，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比拟。

03 大湾区的今生：激荡四十

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哈耶克“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”的最佳案例。“中央没有钱，可以给些政策，你们自己去搞，杀出一条血路来！”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，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，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，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，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，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：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，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”

因此，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

束、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，不唱高调，在徘徊迷茫之中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：“发展就是硬道理。”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。

细品邓小平的这几句话，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何把福建、广东选为开放的前沿阵地。第一，闽粤毗邻港澳台地区，有借助外部动力的可能性。第二，正是因为闽粤位于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汇处，矛盾空前尖锐，1976—1978年间广东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逃港事件，无数内地人诀别家人、逃赴香港。局面之严峻，让中央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。

第三个——也是最重要的原因，闽粤位于边缘地带，远离中央，作为对台湾地区防卫的前沿阵地，时刻备战。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主要投入

在“三线（内地）建设”上，基本放弃了沿海经济发展，大型的项目几乎都没有在广东落户。因此，即使经济特区的探索出师不利也无碍大局，这实质上还是广东历史上“无足轻重”特色的延伸。

在邓小平的默许之下，所谓的经济特区探索，本质上是一场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探索，一场以“对外开放”来推动“对内改革”的微创手术，一场收益最大化、代价最小化的精明生意。一切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改革措施，在经济特区里都被默许先行先试，执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宽容——“先看看再说”。一旦尝试成功，其经验便可以有条不紊地向全国推广；一旦失败，则吸取教训，另谋新路，把损失控制于福建、广东一隅。

以小博大，以开放促改革，这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历史使命。读懂这一点，方能读懂改革开放。而具体到实处，担此重任者，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重要二传手作用的、被广东人民亲切称为“广东的邓小平”的任仲夷。

那时任仲夷已是近八十岁高龄。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，我